

以依賴理論分析貿易保護政策及一帶一路倡議造成美、中區域經濟角色之互換

呂嘉穎¹

摘要

川普上任後退出歐巴馬時期所加入的 TPP，欲將經濟主軸以保護政策移轉回美國本土。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大陸則透過一帶一路倡議連結歐、亞、非三大板塊，從資金、基礎建設、交通等層面建立以中國大陸為主的「關係」鏈。美、中兩國在自由貿易的政策上，產生了與先前領導人截然不同的政治思考，而這也造成兩國在區域經濟上之角色互換。本文以依賴理論作為分析之根本，從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之間關係，論述美、中與他國在經貿上所產生的連動性，另就相關政策與外交層面進行討論，探討美、中貿易保護政策及帶路倡議所產生的區域經濟角色互換，背後可能意圖及產生之影響進行分析。

關鍵詞：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一帶一路、貿易保護政策、依賴理論

¹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通訊作者：呂嘉穎，E-mail: m0227118@gmail.com
投稿日期：2017/10/03 接受日期：2018/06/22

壹、前言

冷戰後，世界各國為了復甦因戰爭所導致的經濟遲滯，紛紛以市場導向作為主要經濟政策，也因此促成了跨區域、跨國界的全球化、區域化經貿組織及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的誕生。

區域經濟思維強調自由貿易的本質為市場開放，也因為市場開放所呈現的關稅壁壘消除，使得各國產品得以自由流通於不同國家，而藉此獲取最大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元為首的布列敦森林體系 (Bretton Woods system) 塑造了美國在自由貿易上的領頭羊角色。區域經濟透過自由貿易對整體貨品的流通，提供了架構性的思考方式，而這種具戰略性質的協議架構，在美國經濟受到金融風暴等危機衝擊時，勢必為了減低損失，透過轉移發展重點至與其他區域市場連結，藉以維持整體利益之穩定。歐巴馬 (Barack Obama) 政府所提倡的重返亞洲政策 (Pivot to Asia) 希望藉由經貿上的影響，所構築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可做為美國欲藉經貿相對優勢實力影響亞洲，進而創造利益的最佳佐證。川普上台後呈現的經貿政策思考則與歐巴馬背道而馳，所簽署的第一項行政命令為退出 TPP，並將經濟重點移轉回美國本土，另藉貿易保護政策作為使「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施政主軸。

鄧小平於改革開放中所強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入市場經濟機制，使中國大陸的經濟模式邁向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世代。但整體而言，直至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中國大陸經濟才算正式的與世界接軌。此時的中國大陸仍受到以美國為首的海權式經貿思維所限制，無論在市場開放、經貿規則上都須就美方為主的經濟組織，所制定的「遊戲規則」作為框架而處處受限。習近平上台後，提出了以歷史、地緣基礎為主要概念的「一帶一路」¹倡議 (initiative)，希望藉由地緣、歷史等關係 (Guanxi)² (Pye, L. W., 1995; Feng, H., & He, K., 2017; Shih, C.Y., 2017) 為連結導向，形成具中國大陸特色的區域經濟模式，藉此削減美國透過經貿組織對其市場、政治等層面的過度干預。

1 下以「帶路」稱之。

2 如果將 Guanxi 一詞，放在近代中國的論述框架中，可以知道「關係」除了單純的人際連結外，將其運用到中國政治上，則在群體上所呈現的態樣，應較近似於「派系」思考，而這種型態的存在，亦將「關係」功利化、務實化，或演變為權力掌握的手段。若從另一個角度觀之，當「中國崛起」後對他國的投資、援助，甚至是市場開放等實質利益，都將對冷戰後以美國政策為主軸的國際秩序有所衝擊，也是因為如此，其餘國家在「派系」選擇上，得以依自身最大化利益做出思考，並不一定要納入以美國為首的經貿體系下。另外從石之瑜教授的「關係平衡」觀點論之，更能發現中國大陸以雙邊關係的實質協商，逐漸取代多邊關係下的規則適用。也因為如此，以往在國際關係中屬於較弱勢的國家，透過與中國大陸對等的雙邊談判，在獲取最大化利益同時，亦能使得這種「關係」網路的連結，遠較單一規則適用上的被限制性，具有彈性且更能符合雙邊的考量。

美、中為世界兩大經濟體，政策之更替與區域經濟產生之衝擊與關聯過於複雜，本文以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 作為分析美、中在川、習兩人上台後，對於區域經濟政策思維的轉變及角色之互換，並分析可能產生的影響及因應之道。首段藉由文獻回顧之方式，探討區域經濟與美、中政策的連結性，並簡述依賴理論之重點，以為後文形塑論述架構。再就雙方在區域經濟政策上的轉變及衝擊做出探討，並分析川、習兩人為何在取得領導權力後，做出與前朝相異的政策轉變，文末則提出個人看法與本文總結。

美、中兩方因考量差異而推出不同思考的政策時，所牽動的程度、範圍，並不僅限於國家內部，而可能產生整體性溢出效應 (Spillover Effect)。也因為如此，貿易保護政策與帶路倡議，在區域經濟上所造成的連動性影響，以及原本在經貿體系中所扮演角色之互換，在在說明了二戰後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全球經濟架構，逐漸面臨「中國崛起」所帶來之挑戰及威脅。然而，這種挑戰及威脅是否代表了中國大陸經濟逐漸擺脫美國的「掌握」？抑或是另一種型態的「中國式全球化」？又或者其他國家、區域在面對到美、中截然不同的政策時，應以何種方式看待川、習兩者對於世界、區域經濟結構的考量？

WTO 對於國家發展狀況的評等，其實就是一種位階性概念的使用，雖然在評鑑上，仍採取經濟指標量化的思考模式，將其區分為已開發、開發中國家等，而產生了位階性的思考。當已開發國家需要對開發中國家採取更多的優惠措施，使開發中國家能針對已開發國家「讓利」的部分貨品，加強出口獲取利益。而這不等同於依賴理論中變相的核心國家思考邏輯？由於位階概念解釋的途徑眾多，本文試圖以 WTO 概念下的開發中、已開發國家，以及國家主要產業結構作討論之依據³。

多極世界的思考邏輯，並非單極世界所形成的概念框架。美國採取貿易保護政策，對前任總統推動的「全球化」，似乎呈現急轉彎的態樣。而中國大陸在習近平上任後，卻積極以帶路倡議連結各國。美、中區域經濟角色的互換，對吾輩而言，必須謹慎思考該如何面對及因應，當世界經濟走勢仍陷疲軟不振時，如何從美、中經貿角色互換獲得己身最大利益，成了優先考量的準則。期能就此文對台灣在未來與美、中經貿交流上，以不同之角度思考美、中對於區域經濟所可能衍生的衝擊及影響。

貳、文獻回顧

對於美國而言，霸權穩定理論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的使用是建構在單極世界上，現今的社會在金融風暴後，美方已無力承擔單極世界對其經濟帶來的影響，且逐步朝向雙極、多極的概念進行概念修正。而互賴理論

3 如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服務業為主，或第二、三級產業在經濟上的產值，造成的上下位依存關係，便為位階性思考的一種觀點。

(Interdependence Theory) 所強調的國家相互影響，無論對美、中而言都無法單一性的去解釋雙方關係的消長及位階性。另外，若以權力轉移理論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論述中美關係，雖然雙方至今仍存在著軍事設備上的競逐，或政治語言的恫嚇、反威脅，但依目前川、習二者觀之（或以美、中看待），似乎仍未升溫到權力轉移理論中的「準戰爭」態樣，亦未有權力真正「移轉」的情況發生。也因為如此，本文試圖以依賴理論解釋美、中在區域經濟角色中所產生的互換結果，從雙方領導人在經貿思考上的轉變分析兩國於區域經濟上可能產生的影響。

依賴理論強調世界上國家依其經濟發展狀況的不同，而有上下位階性的差異存在，也因為位階性所帶來的市場經濟結構不同與產品供應鏈連結，可以發現相對弱勢的國家與優勢國家間所存在的經濟關聯性極強，在得到幫助的同時也造成了發展受到限制的反效果 (Smith, T., 1979)。原因在於資本主義所強調的貨幣及資本輸出，導致弱勢國家經貿發展程度，更受相對優勢國家經濟影響而明顯滯後 (Weeks, J., 1981)。

伊曼紐·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認為工業化國家為世界主要經濟核心，不同的產業類別導致國家在經濟本質上有所區分，邊緣國家向核心國家輸出產品，且市場結構為勞力密集型產業，核心國家藉工業技術之領先形成經濟上的不平等，並希望藉得到的利益得以維持與邊緣國家一定程度的地位差距 (Hein, S., 1992)。也因為如此，對過度依賴他國而維持國內經濟的國家來說，由於工業發展受到世界先進國家所產生的規範、組織之限制，在相對不平等情況下，依賴關係所導致的經濟滯後，則使得經濟上的階級差距越來越大 (Uche, L. U., 1994)。

經濟相對弱勢的國家在經濟、外交等國家主體應具有獨立思考的行為，受到核心大國制約時，則可能因此形成，以優勢國家作為組織核心，並為區域經濟決策者的共同決策圈，由於成員國中所能得到的利益多半來自核心國家，故形成了區域政治權力集中於核心國家的可能 (Tausch, A., 2010)。

依賴理論認為經濟弱勢之國家可透過切斷與經濟強勢國家之間的過多連結，藉由貿易上的自由發展從產業結構上進行調整，透過自主性的利益獲取 (Reyes, G. E., 2001)，並對國內實質需求加以重視，以此作為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經濟活動的基礎。

如前所述可知依賴理論具備下列重點：

- 一、強調經濟優勢國家與弱勢國家經濟的連動性
- 二、利潤分配不利於落後國家發展
- 三、政治意圖內化於經濟政策其中
- 四、區域經濟中的核心與邊緣國家之區分

由於依賴理論發展時期久遠且流派眾多，為避免本文流於理論介紹，故僅以前述四項重點為其根本討論基礎，就川普所採用的貿易保護政策及習近平的帶路倡議作分析，從依賴理論為出發點，分析美、中在近代思考對於區域經濟政策的

轉變及角色互換原因為何？並就雙方區域經濟之思維轉換所產生的相關影響進行論述。

參、依賴理論下的美、中角色互換？從「帶路」與「貿易保護政策」觀之

美國藉由布列敦森林體系下的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及世界銀行 (World Bank, WB)，對其他國家之經濟塑造與其國內經濟的關聯性(Wade, R., & Veneroso, F., 1998)⁴，希望透過全球化及相關經貿組織的成立和可能造成的影響，將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下所強調的市場開放及自由貿易、國際貿易等目的投射至他國政策中，並預期產生對輸出國利益之最大化效果。川普上任前的美國政府也同樣的以此為基礎，將區域經濟藉由 FTA 的方式試圖創造美國最大的利益。雖然自由貿易形塑了美國為世界「霸權」及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但自由貿易模式之使用並非沒有產生爭議，由於其中蘊含的位階型觀念，使得產品輸入國與輸出國間的經濟關聯性越來越強烈，為了將可能產生的利益最大化，市場開放似乎成為經濟優勢國家，為了維持長久性的地位考量，所採用的必然手段之一 (Ferguson, J., 2010)。另外，新自由主義所在乎的是區域整體市場開放下，所帶來的利潤及輸出產品的可能，在美國於金融風暴後及世界整體經濟普遍低落的同時，各國經濟開始呈現衰退，海外市場逐漸萎縮，人們開始反思貿易保護主義 (Protectionism) 的可行性。

中國大陸在經濟隨著產業結構改變而成長後，一躍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在發展過程中，中國大陸也注意到了美國以區域經濟獲取自身利益的模式，及產生連帶性質的可能影響，因此習近平上台後所提出的帶路倡議，一方面藉由歷史軌跡及地緣政治之優勢，塑造出中國大陸特有的經濟體系，二方面則積極強化科學對工業技術的影響及創造優勢，並藉此擺脫美國對其政策、經濟上的介入 (Swaine, M. D., 2015)。

中國大陸在加入 WTO 後，確實透過經貿組織的規則，使經濟優勢國家對其市場開放而為國內經濟帶來利潤，但隨著經濟成長速度逐漸放緩，產業結構勢必面臨轉型之可能。習近平上台前的中國大陸領導人經濟政策，仍呈現較為保守的狀態 (Yu, Q., 1998)。縱然鄧小平提倡經濟方面的實質改革開放，但為了鞏固其政權，對外來資本之投入以及參與國際性的經濟組織的可能，仍以較為嚴謹的方式審核並面對之。

4 如亞洲國家所產生的債務多為外債及本國貨幣貶值所帶來的匯差，而這些債務的存在對於經濟發展而言，所產生的障礙不容小覷。

綜前所述，在川、習兩人上任之前，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在經濟結構、工業技術層面，所呈現的位階差異，使得雙方在經濟上仍呈現一定程度的依賴性，且在經濟政策上明顯呈現出主從地位關係，政治、外交方面亦然相同。但川普上任後為實現其競選承諾，而簽署退出歐巴馬政府所架構的 TPP，改採以美國本土為主的貿易保護政策 (Freund, C., 2017)。以及習近平建置強調共存、共榮連結歐、亞、非三大板塊的一帶一路，兩者呈現出皆與前朝領導在經濟思維上的反向思考。

故本段藉由前段所述之依賴理論四大重點為立論基礎，對美、中雙方在區域經濟角色上的互換做出論述，並分析雙方政府經濟思維改變的原因及可能就區域經濟產生之結果。

一、區域經濟連動產生的問題

全球化對於經濟結構而言，為將單一國家經濟結構轉變成區域整體的共同行為，當經濟活動以區域整合之方式施行時，優勢國家所居的領導地位及其國內政策之變更，都可能影響區域經濟整合下的其他國家之經濟狀況。

美國在戰後透過貨幣政策及強大的軍事實力所形成的「霸權」，使得多數國家在經濟上、國家安全上多仰賴美方所提供的保護 (Nye Jr, J. S., 1990)。也因為如此，經濟政策所產生的相互依存性，對於位居不平等位階下的弱勢國家，僅能依循著美國在經濟政策下，所建構的規則進行相關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由於美國對於世界事務的積極介入，所形成的戰略連結網路龐大且複雜，為了使經貿影響力能創造更大的利益，藉由市場開放及專業分工等政策，企圖使邊緣國家產業朝向單一化發展。這也形成了以美國為核心國家的區域經濟依賴關係，使邊緣國家市場商品呈現單一性，在國內經濟與核心國家連動性強的前提下，經濟崩潰的可能性較高，相對的核心國家所需負擔的責任也較大，當美國經濟政策有所調整時，所可能產生的連帶效應對於邊緣國家產業衝擊亦然明顯。

中國大陸在加入 WTO 後，產業逐漸由初級產業轉型為代工製造業，多以輸出產品做為主要經濟模式，2008 年金融海嘯過後，世界整體景氣低迷，中方亦開始思考產業轉型之可能。在中國大陸藉著美方經濟體系因金融風暴而重新架構時，藉由國家政策的支持促成貨幣及經濟的逆勢崛起，使得原本以美元作為主要交易貨幣之地位受到動搖 (Garrett, G., 2010)，且區域經濟的影響力也同時被削減，除美、中兩國之外的其餘國家，與兩國間的經濟依賴程度也呈現消長的態樣。以下就美、中兩國自 2000 年以來經貿依存度作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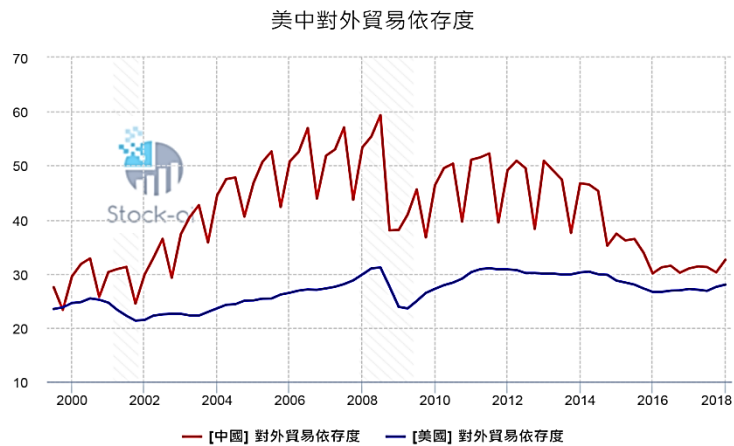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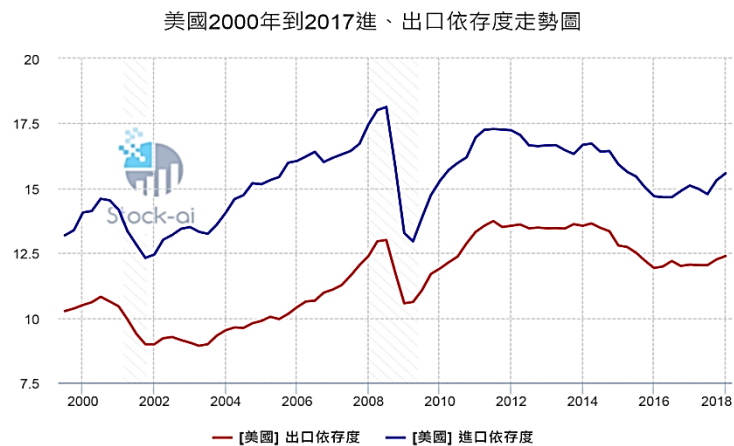
圖 1 美、中 2000 年到 2017 對外貿易依存度走勢圖⁵資料來源：<https://stock-ai.com/>

圖 2 美國 2000 年到 2017 進、出口依存度走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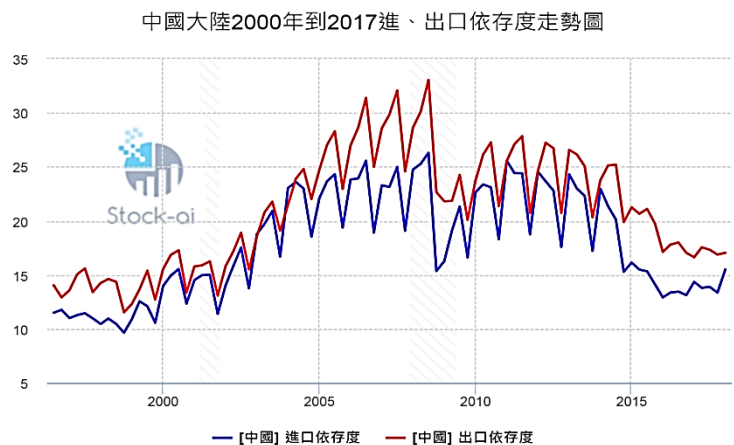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https://stock-ai.com/>

圖 3 中國大陸 2000 年到 2017 進、出口依存度走勢圖

資料來源：<https://stock-ai.com/>

5 對外貿易依存度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為國家進出口總額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其中又可分為進口與出口兩大項，主要可反映該國對於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亦為衡量對外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

由圖 1 中可知中國大陸在對外貿易依存度上大於美國，顯示其經濟結構與國際市場連結較強，然而從本質上來看，因中方在加入 WTO 後，產業轉型為代工製造業，因此無論在商品的進、出口隨之呈現較大起伏，主因為 WTO 所強調的市場開放帶來的衝擊與改變，同時也加強了中國大陸經濟與區域市場的連動結果。但從 2015 年開始，美、中在對外貿易依存度上逐漸接近，顯示了中國大陸在產業結構上面臨了再次的轉型，成為與美國近似的產業類型，而逐漸降低與外國的貿易依賴程度。圖 2 顯示美國近年來進出口差距逐漸加大，代表美國經濟逐漸仰賴出口貿易，但進出口之比例仍未有太大變化。圖 3 則為中國大陸進出口依存度走勢，由圖中可知進出口依存度有逐漸接近之情況。當進口依存度大時，受到國際經濟情勢影響可能性較大，出口依存度大，則可能面臨他國反傾銷調查的情況。

對外貿易依存度反映的是各國與國際社會在經濟市場的關聯性，由圖 1 中可以發現美、中兩國在影響性上有逐漸接近的可能⁶。如將美國視為依賴理論中的核心國家，則前述之論點可資佐證中國大陸亦逐漸成為經濟核心國家。但當對外貿易依存度與區域經濟呈現連動時，國家內部經濟則可能受到區域經濟的起伏而隨之改變，反之亦然⁷。

因中國大陸逐漸成為經濟核心國家，帶路倡議可視為對受國際情勢影響的整體經濟低迷解套，由圖 3 可知中國大陸進、出口依存度皆低於 2008 金融風暴時期，代表其經濟模式在受到世界經濟衝擊後，逐漸轉至以國內市場發展為主。現今中國大陸面臨產能過剩、內需市場飽和、區域發展不均等問題，若未能以區域經濟之方式將產能及勞力密集產業輸出，則可能面臨到經濟停滯的危機 (Krekova, M. M., Tupchienko, V. A., Zhagparova, A. O., Lisichkina, Y. S., Novikov, V. S., & Kramarenko, E., 2016)。美國在進、出口依存性仍呈現約略恆定的情況下，若欲使國內經濟再次復甦，則須考慮將可能受制於國際經濟的風險逐漸降低，並使產業回歸本土。

二、利益分配不均

依賴理論認為邊緣國家因出口工業原料予核心國家，而在經濟上產生了對於核心國家的依賴性，而這種依賴性的產生，也使得邊緣國家在經濟市場上，受到了核心國家透過經貿組織、跨國企業等具強勢經濟領導力的市場傾軋，而使得邊緣國家產生了貿易逆差 (Grosfoguel, R., 2000)。由於核心國家多藉由他國對其經濟依賴的特性，將帶有殖民式的市場開放觀念強加於邊緣國家，使得邊緣國家因外資企業占多數，且多將所得利潤運回母國，而邊緣國家本身卻無法獲得相對應

6 由於進出口依存度又因商品種類不同而有不同的分析方式，本文並非經濟學的論述分析，故僅就進出口與國際市場連結性試圖討論之。

7 對外貿易依存度為進出口總額占 GDP 或 GNP 的比重，亦即當對外貿易依存度越高，說明了該國經濟較為依賴國際貿易。當然，進出口依存度亦能反映該國經濟對外部經濟的依賴程度，故本文採用兩種比較方式做論述。

成長的產業利益。長久下來造成增加之利益為核心國家獨享，而邊緣國家僅能以他國援助來發展核心國家所希望發展的產業類別。

美國自戰後透過國際經貿戰略對世界各地以市場開放的方式獲取利益，同時將西方經貿模式以組織規則對他國市場產生限制，該種方式亦然塑造美國成為核心國家的角色。在中國大陸加入 WTO 後，龐大的人口基數及內需市場便成為了美國經貿投資的首要對象，於此同時中國大陸的商品也迅速銷往美國市場。一來一往間，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赤字越來越大 (Noble, W., 2017)。

如果從圖 4 來看，中方 2001 年加入 WTO 後，商品逐漸向美國市場傾銷，使得貿易差額急速擴大，使得原先美國核心國家的地位改變，逐漸產生如依賴理論中邊緣國家之貿易逆差。對美國而言，將中國大陸市場透過經貿體系規則開放，確實可能形成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連結的態樣。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當時的中國大陸確實必須從二級產業著手，並與核心國家市場形成產銷鏈，藉此發展自身經濟，此時的中國大陸在市場上是依賴美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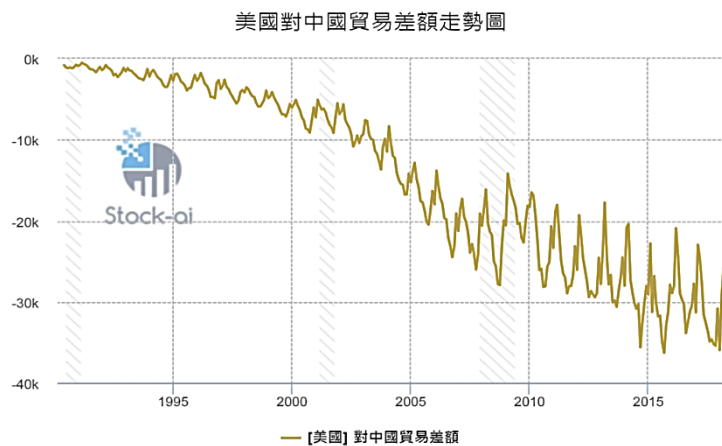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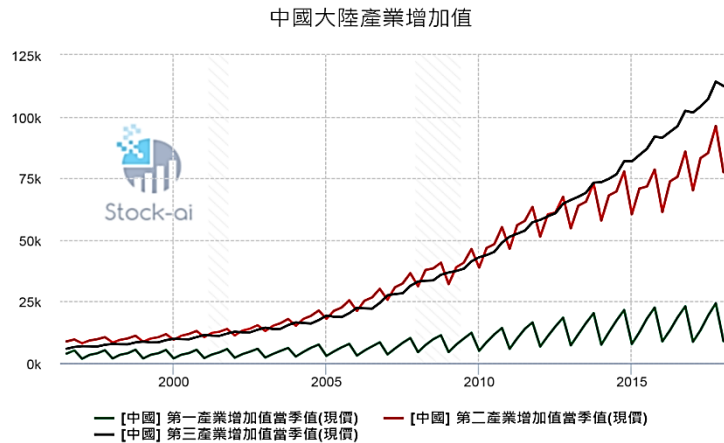


圖 4 美國對中國大陸貿易差額走勢圖⁸

資料來源：<https://stock-ai.com/>

然而，若以依賴理論做判斷，美國因經貿優勢所呈現的霸權地位理應維持，但為何卻呈現反轉狀態？理由在於中國大陸市場開放後，縱然對於外資投入抱持樂觀態度，但實際上中方政府仍透過內國法規對於外國投資者予以限制，如於 2000 年所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雖然就外資投入中國大陸市場予以明文化支持，但其中第 3 條卻又將禁止投入之行業別交由國務院規定，這也造成了所開放的產業外資因利益、風險之考量不願投入，而外資有意願投資的行業卻因法規、政策之限制不得其門而入。中國大陸在 WTO 中被視為開發中國家，而為已開發國家的美國自然須對其提供更多的市場開放，在利益所得此消彼長的情況下，也使中國大陸順勢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8 所謂貿易差額是指在一定期限內，出口總值與進口總值間的差額，若出口大於進口，稱順差（出超）。若進口大於出口，稱逆差（入超）。

圖 5 中國大陸產業增加值走勢圖⁹

資料來源：<https://stock-ai.com/>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在企業掌控上與西方自由貿易市場有所不同，多數具利益性質的產業仍多有國營企業的影子存在，再加上中方對於貨幣政策上之善用，使得所得之利益足以促進產業升級成為工業化國家之流 (Yang, Z., Wu, S., & Shen, Y., 2017)，並且逐漸朝向已開發國家前進，而這亦可從圖 5 中，中國大陸產業結構改變可見一斑。在產業轉型後，商品的輸入與輸出，便改變了依賴理論中，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的繫屬關係。如一國產業以工業為主要結構，所生產之產品，若依依賴理論而言，必然輸出至核心國家市場內。但產業結構轉變為以服務業為考量，在產品輸出上，並不見得須以核心國家為本，而可能因此改變，逐步形成另一個雙極世界下的核心國家。故在產業轉型後，中方所扮演的角色便與美國等具經濟優勢之國家相同，部分論者認為資本主義的增長是有週期性的，因美國目前正值循環低點，而中國大陸則呈增長之姿 (Pérez Caldentey, E., & Vernengo, M., 2016)。

因此在美國利益被削減、中國大陸利益增長之際，美國開始思考海外投資是否能夠真正的促進實質利益增長，FTA 模式下的利益獲得者並不盡然是實質上的成員國，由於 FTA 對於非成員國所形成的貿易壁壘過高，以及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補貼制度，都可能形成未來經濟狀況的限制 (Cooper, W. H., 2014)。川普認為美國須以製造業為本，藉此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並復甦其低迷不振之經濟，於上任後便將政治意圖較高但實質利益卻少的 TPP，以行政命令廢止之 (Storey, I., & Cook, M., 2016)，使其得以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之願景。

中國大陸藉由 WTO、FTA 等經貿組織與自由貿易協定，促使其經濟快速成長，但在內需市場逐漸飽和之際，經濟也隨之放緩。當中方逐漸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經貿霸權時，為了維持其經貿優勢地位長久，所採取方式必然朝向依賴理

⁹ 產業增加值為一定時期內單位產值的增加值，亦即相同產業在該時期的最終生產成果。其中第一級產業為農業、第二級為工業、第三級為服務業。2000 年時，工業、服務業增加值約略相等，至加入 WTO 後，工業發展極具成長，其後，經濟快速增長，所導致的產業再次轉型，說明了中國大陸在近十年來，經濟結構逐漸朝向已開發國家，以第三級產業做為基礎。

論中的核心國家靠攏。因此若以核心國家解釋帶路倡議下的中國大陸，則可以發現中方對於他國仍以邊緣國家視之，若僅就利益性質做出思考，則易於使他國有「以經濟控制主權」的疑慮產生，為了避免爭議，藉由關係的連結 (Shaalan, A. S., Reast, J., Johnson, D., & Tourky, M. E., 2013) 合理化、友善化他國在帶路倡議下對於中國大陸的依賴性。

三、政策性思考

歐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政策，除了維持與友邦之間的關係外，更重要的是對於大國崛起後的中國大陸，以等同視之為「霸權」的方式做出因應機制 (Campbell, K., & Andrews, B., 2013)。由於 TPP 政治性質過於強烈，且在經濟策略上多以美國現有之經貿實力就相較弱勢之國家予以協助，對於美國而言則是加大了經濟上的支出卻未獲得相對應的可能利益。歐巴馬曾稱其因 TPP 之設立而成為了「太平洋總統」，藉經貿政策之連結與 ASEAN 及其友邦形成經貿戰略網，並消除中國大陸在歷史、地緣政治等層面與歐洲、東南亞相連結形成的依賴性 (Hung, M. T., & Liu, T. T. T., 2009)。

TPP 為了維持美國與邊緣國家之依賴性，不得不從經貿協助著手，除了就相對應的經濟問題以區域經濟的方式解決之外，同時也等同於美國必須對於太平洋區域的和平做出相等的保障。但以依賴理論作分析可知，原處於核心國家的美國在經濟發展下應從邊緣國家獲得較大的利益，但為了避免同樣為核心國家的中國大陸對亞洲區域所可能產生的利益進行瓜分，不得不把依賴關係中的主從位階倒置，強調對於有所依賴程度的邊緣國家以美國的優勢經濟確保利益的創造性，而這種論點可從 TPP 中並無中國大陸加入其中得到證明 (Wilson, J. D., 2015)。

但為了維持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影響力，所付出的代價卻大於可得之利益，使得美國國內經濟在面臨就業率低迷、失業率高等問題時，又需承擔海外貿易所可能產生的風險及維持軍事開銷之費用。由於長時間的經濟疲軟不振，美國民眾開始對全球化的自由貿易感到疑惑與不安，認為區域經濟中的自由貿易策略真能為美國帶來利益嗎？而這種疑惑也促使了川普以貿易保護政策，取代自由貿易的全球化策略，但貿易保護政策卻將原先的依賴關係重塑，當核心國家以保護之姿態對內國產業扶持，進而阻絕邊緣國家與其所存之關聯，勢必造成邊緣國家經濟受到影響。對川普而言，實質性的美國利益遠較政策性質的依賴關係來的紮實且穩固。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加入 ASEAN+3 後，在經貿上與東南亞國家以及日、韓所產生的連結性更為強烈，因 ASEAN+3 在歷史、地緣層面所具備的文化連結性及地緣政治關係，使得中國大陸在亞洲經濟地位愈發受到重視 (Holst, D. R., & Weiss, J., 2004)。但 ASEAN+3 中的 FTA 模式仍為西方自由貿易模式，中國大陸希望打造屬於自身的經貿模型，將自由貿易中侵略意涵淡化，而從互助、共榮的角度，加強中國大陸為核心國家的必然性及邊緣國家與其連結。

帶路倡議並不強調市場開放，而是對於落後國家的基礎建設加以協助並提供原料、資金之協助。依賴理論強調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在經貿上的連結性，而這種連結性並非僅是資金或貿易上的關聯，帶路倡議以基礎建設為本，產生的交通設施連結，著實能夠降低貿易成本，同時也加強了經貿發展連結的力度。另一方面，當基礎設施建置完成後，人員的培養、維修資源等方面仍須以中國大陸為主，並同時向中國大陸提供後續維修、培育經費，如此亦形成了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之依賴關係。

若以美、中政策作為分析，帶路倡議與美國所提出的全球化經貿在本質上相同，但不同之處在於西方的經貿思考侵略性質較為明顯、直接且講求即時性，而帶路倡議則以生活之根本著手，強調長期性的關係鏈結。美國從戰後到川普上任之前，所具備的經貿、軍事優勢，在全球化過後核心國家角色受到金融風暴之牽連而漸趨黯淡，此時的美國亟需重整本土經濟，故貿易保護政策的使用也可視為「霸權」之休養生息，縱然川普在經濟政策上移轉回美國本土，但對於中國大陸之崛起仍透過政治、外交上的實力降低可能帶來的影響。

綜前所述，當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之依賴程度有所動搖可能時，邊緣國家為了生存，依照依賴理論而言，必然抗拒另一個核心國家的崛起，而選擇自立自強方式藉以發展經濟。也因為如此，中國大陸帶路倡議並不強調自身的崛起，而是希望透過經濟、貿易上的彼此連通，降低邊緣國家產生排斥的風險，使得區域經濟能夠達成共同繁榮之盼望。

四、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之界線模糊

布列敦森林體系形成以美元為首的區域經濟組織，美國也因此成為依賴理論中的核心國家。戰後經濟多以美國政策馬首是瞻，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因戰爭所衍生的經濟停滯，也造成了工業發展落後的必然結果。當時的美國亟欲藉由經濟上的優勢開發海外貿易市場，藉由市場經濟所形成與邊緣國家的連結關係，使得區域經濟下的依賴透過彼此產品開放之鏈結，而產生資本主義中所強調的自由市場模式。

如同伊曼紐·華勒斯坦對於資本主義所建構的區域經濟做出之評論，認為當核心國家工業薪資隨著經濟發展而成長，對於公司而言所可能產生的成本亦然隨之提高，當成本為主要考量之要件時，造成之結果必然朝向工資相較低廉的邊緣國家推展勞動力市場 (Wallerstein, I., 1974)。

中國大陸在習近平上台以前，仍多以勞力密集型的產業為主，並向被視為已開發的核心國家交易所產出的物質 (Beeson, M., & Li, F., 2015)，對中方而言，金融風暴同樣產生絕對性的影響，但從產業結構上論之，可以發現多數具貿易利益障礙的產業仍多由中國大陸政府所支持，虧損所造成的傷害較國外民營公司來的小。另一方面當內需市場足以支撐部分工業化產品的使用時，境外金融風暴形成的風險亦相對降低 (Poncet, S., 2005)。

美國以自由貿易作為維持核心國家地位的手段，但卻忽略了自由貿易所產生的影響大多限於民主化國家，對於非民主國家而言，因受制於統治階層所產生的政策性框架，自由貿易對其所產生的依賴性相對較低 (Milner, H. V., & Kubota, K., 2005)。中國大陸加入 WTO 後，如前文所述，在產品輸出上取得利益相較已開發國家具優勢，也因為如此，當利益逐漸偏向原屬於邊緣之國家時，時間一長便拉近了與核心國家在經濟上之差距。

當核心國家經濟狀況無力維持與邊緣國家之連結，邊緣國家中與核心國家差距較小的主體，便可能藉由其他相對性的優勢而崛起。中國大陸之帶路倡議便是藉著地緣政治上的優勢與其他國家產生連結，強調大國和平崛起後須承擔維持區域安全的相對應責任，藉此塑造核心國家的價值與邊緣國家間的依賴性連結 (Clarke, M., 2010)。現今的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確實與美國得以分庭抗禮，為了謀取更為長久的利益發展，將原先保守的經貿政策轉以多邊互動的機制呈現歐、亞、非一體的經貿戰略中心。

縱然歐巴馬政府為了維持與亞洲國家的連結，採取了政治性質較為強烈的 TPP，希望以經濟上的連動對抗中國大陸與鄰近國家，如俄國、ASEAN 等逐漸加強的經濟關係。然其成員國至今仍面臨經濟泡沫、金融風暴所帶來之後續影響，對於美國可能產生的實質利益較小，且又須承擔美國國內企業外移之風險，故川普上任後便予以廢止之。雖然川普此舉等同切斷與邊緣國家部分連結，使保護主義減少了因全球化、區域化經濟產生的影響，但美國仍透過軍事、政治等手段，維持與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上相對平等的態樣。

如前所述，當美國逐漸透過貿易保護政策使國內經濟復甦之時，也代表了在二戰後所形成的核心國家地位可能受到威脅，但這種威脅並不見得是取代其領導地位。雙極世界的形成為較可能產生之結果，當帶路倡議使得中國崛起的事實被其他國家以核心國家視之，對於佔有地利之便的中國大陸而言，與四鄰之交往便成了依賴理論所強調的依賴性及連結性。因此習近平對於一帶一路向來強調「互助」、「共榮」，也是將資本主義下的侵略意涵減至最低，希望以關係鏈的形成，從友好、實質且最貼近人民生活的基礎建設出發，藉此抵抗以經貿實力組成的圍堵網路。

當美、中雙方因經濟實然面所產生的差異，而導致政策思考不同的情況。原被認為屬於邊緣國家的中國大陸，在經濟崛起後一躍形成了以帶路倡議為主的陸權核心國家。而美方在認清因自由貿易過度擴張所產生的經濟耗損，與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的失業率高、就業率低等結果後，則寧願成為經貿上的相對邊緣國家，從自身經濟調整作為下一階段的考量。美、中於區域經濟中的角色互換，顯然符合依賴理論中，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所形成的依賴關係及呈現反轉之可能。

肆、邊緣國家對美中政策改變產生的影響及因應之道

當美國逐漸將核心國家之單一地位分給了崛起後的中國大陸，吾輩所需思考的問題在於，美國是否真正將其施行政策之重點回歸美國本土？抑或是在認知到維持與邊緣國家的依賴關係所可能產生的經費耗損遠較可得利益來的龐大而認賠殺出？川普具備的商人背景，若將美國視為公司經營，則對利益的強調遠大於政治地位的考量。如將貿易保護政策視為公司之本業，TPP 則是非本業且虧損風險較大的投資標的，川普的政策運用便為維持公司營運所採行的必然手段之一。

而習近平對於中國大陸經濟逐漸放緩，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實質上可以理解為政治功績之塑造，從根本面來看，當中國大陸產能過剩且基礎建設逐漸完善的同時，必須思考該如何將資源及產能做出更好的調配以利未來經濟之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內部經濟成長與否，與未來習近平於政治布局上統治權力的掌握仍有所關連。為了使得統治合理化、正當化，必須就經濟問題做出解決，同時為了避免受到美方所形成的經濟包圍網壓迫，中國大陸的「走出去」為必然之結果。在面對到資本主義下自由貿易對於他國市場的介入，習近平強調關係之結合、歷史地緣之必然的依賴連結，相較於海權的強硬，陸權經貿的建構所產生的抵抗可能較小。

美、中於依賴理論中角色的互換，對於區域經濟而言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本段試圖分析以美、中兩國為核心國家之邊緣國家，在因應上及可能受到的影響為何，並試圖提供個人面對該問題之看法。

一、強調邊緣國家與雙方之連結

依賴理論中認為核心國家對於邊緣國家市場產生的影響極為龐大，藉由自由貿易之實，可能產生產品單一化問題。也因為如此，邊緣國家若在雙極世界上選擇單一核心國家形成依賴關係，產品所產生的單一性於經濟發展之風險過高。故在區域經濟政策考量下，應與美、中雙方無論在帶路倡議或貿易保護政策中，皆找到連結性並藉此發展。在風險分散所可能帶來的利益可預測性，為邊緣國家於區域經濟中政策評估的一種方式。

如現今亞太地區國家，在美、中區域經濟角色轉變時，所扮演的重要性逐漸增加，當美中雙方在雙極世界中，產生的經貿競逐，所謂「邊緣國家」的重要程度，已不限於依賴理論中，單純將商品輸入該國市場，以獲取利益的思考。由於美、中經貿競逐所可能，對邊緣國家加以爭攏的情況，除了政治上的考量外，對被視為邊緣國家的各國而言，亦可藉此機會從中獲得相對性的利益。如商品多樣化、市場開放所產生的利潤、雙邊貿易帶來的關稅減免等。

若從美、中在亞太地區的經貿競逐觀之，可以發現扣除部分已開發國家，ASEAN 與美國、中國大陸，在經貿上的聯繫較為緊密，也呈現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的連結態樣。以圖 6、圖 7 所示可知，美、中在 2010 年開始，對東協十國

貿易差額呈現兩種不同的情形，中國大陸因推行帶路倡議、「走出去」等政策，使得國內能源、產品不斷輸出 (Economy, E., 2005)，故貿易差額為正，呈現出超態樣。而美方在 2012 年後，將經濟結構轉為以國內發展為主，特別是在 2016 年後，入超情況更是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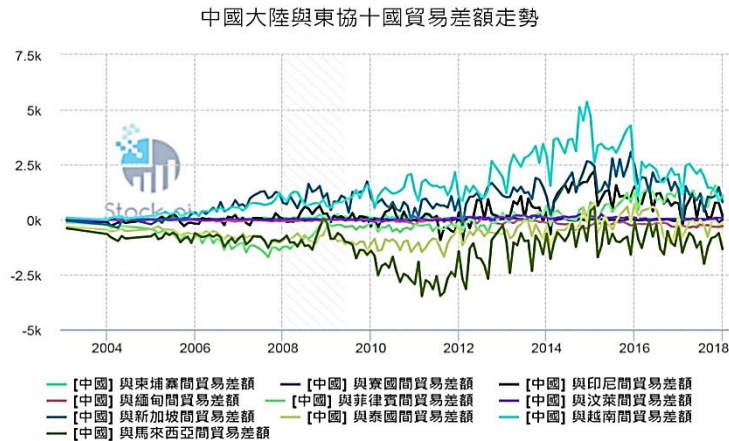


圖 6 中國大陸與東協十國貿易差額走勢圖

資料來源：<https://stock-a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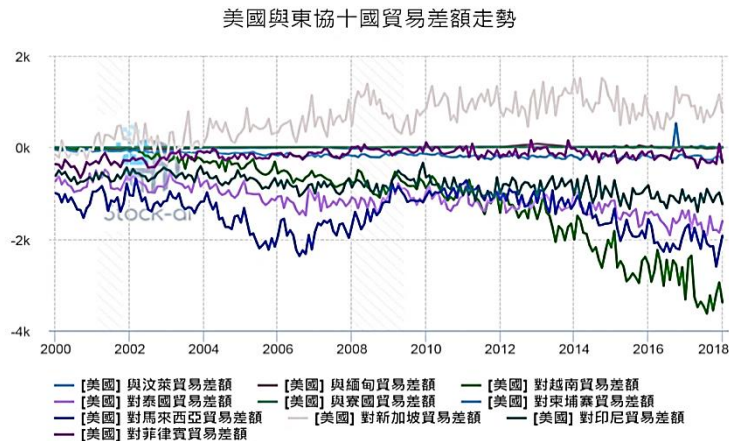


圖 7 美國與東協十國貿易差額走勢圖

資料來源：<https://stock-ai.com/>

從美、中對邊緣國家貿易差額來看，能夠佐證中方藉帶路倡議，對邊緣國家所輸出的產能、原料，以及相對帶來的利益。然而川普上任後，所提出的貿易保護政策，亦將原先透過優勢工業，所形塑與邊緣國家的連結 (Hang, N. T. T., 2018)，逐步修正為以美國本土市場為重。然而川普並不可能使中國大陸藉此更加壯大，故透過其他層面的影響，迫使邊緣國家除利益上考量外，仍須思考政治、安全層面所帶來的美中拉鋸。雖然如此，經濟考量仍為國家發展考慮的要素之一，如美方一味以貿易保護政策，限縮他國自貿易所獲得的利益，只會造成邊緣國家逐漸向中國大陸靠攏，而使得中國大陸核心國家的地位愈趨明顯。

在此情況下，原屬單極世界中的邊緣國家，理應藉由雙極世界下，兩核心國家產業結構的轉變，加以思考國內經濟結構隨之轉變可能，透過其中一核心國家技術、產能上的協助，將生產的產品輸出於另一核心國家，藉此獲取一定程度的利潤，或積極發展工業技術，使其逐漸脫離邊緣國家之限制。如情況再次反轉，或出現多極世界下的其他核心國家，由於經濟結構所帶來的利潤，在因應上亦有較多的資本能夠作為後盾，或可藉此連結，發展另一種的貿易態樣。

二、成為半核心國家的可能？

對於美、中而言，所呈現的對抗態樣現今仍無法完全避免，無論在軍事上、經濟上，或是與他國間的交往論之，對於區域經濟而言造成的影響仍大。也因為如此，在美、中兩強優勢經濟夾擊之下，如有第三個國家或區域組織能夠真正瓜分雙方經貿影響力，而形成的三角關係對於邊緣國家，依賴性的選擇則更多也更能回歸根本，並正視核心國家與他國連結的本質。

但核心國家的構成要件較為嚴謹，且對經濟、政治、工業實力要求較高，歐盟在人口基數、貨幣政策上的整合或許有辦法形成核心組織，然其結構並非與美、中相同，為單一主權的國家，故整體政策之施行，較易受到成員國家因自身利益而產生反對之可能，也因此歐盟僅能以半核心主體就美、中雙方抗衡所可能造成之影響，以第三勢力之方式就區域經濟做平衡之思考。

除歐盟外，印度亦為另一個可能成為半核心之國家，與中國大陸相似之處在於，其人口基數大，內需市場便能支撐初期發展所需經濟。在地緣上，無論是海運或陸運，皆有其便利性。然而，中印雙方在政策上、經濟發展上所呈現的差異，亦造成了印度無法以中國大陸發展態樣作為範本的原因之一。當中國大陸先前以勞力密集型產業為主，加上積極參與西方經貿體系，就其產品大量出口至高發展國家，藉由所獲得的利潤，使產業再次轉型為高科技製造產業。並在金融風暴危機時，以政策性的轉型，將出口導向再次轉為國內市場發展。

因中國大陸經貿政策多由主政者所決定，故在利益權衡上，較能迅速且直接的面對可能影響做出改變。再者，於地緣上中印兩國彼此接壤，但中國大陸所具備對他國之地緣上連結性，確實較印度佳。當逐步往核心國家邁進時，勢必造成鄰近各國大量資源、利益被吸引，因此若從該角度論之，現今印度在中國大陸與美國仍呈現貿易競逐的態樣下，且受限於其國內產業結構、貧富差距等，成為核心國家的可能性不高 (Paul, J., & Mas, E., 2016)。但從另一角度思考，若將其人口所產生之優勢，與產業結構調整互相結合，則以「半核心」國家影響美、中經貿，亦不無可能。

三、將政治影響降至最低

核心國家維持與邊緣國家依賴之目的，則是以可得利益做為最主要思考。因此核心國家除了以經貿鏈形成產業結構的連結，另一種可能就是透過優勢經濟影

響其邊緣國家之政治情勢。因邊緣國家經貿政策，可能左右與核心國家之依賴程度，為了維持利益的取得，核心國家勢必透過外交、經貿等手段對邊緣國家國內政治進行影響。也因為如此，為了避免政治過於影響經濟，邊緣國家在思考美、中帶路倡議或貿易保護政策帶來的影響時，必須將政治考量降至最低，從實然面的經濟利益做出判斷，將區域經濟發揮最大的作用，而非以政治立場作為最終衡量之準則。

舉例而言，若美、中在雙極世界下，所呈現核心國家拉攏邊緣國家情況，邊緣國家需就現行情況加以考量，本文認為如前文所述，在選擇上理應無法以單方面維持關聯，而是必須思考整體產業結構、市場等經濟實然面，是否可能受到雙方競逐影響，而產生產業單一化所造成的滯銷、受取捨之風險，由於此時邊緣國家對核心國家而言，政治競爭所產生的利益性，遠較經濟取捨來的可能性高，因此該如何維持中立，卻又能持續與兩核心國家的連結，便為政策上須妥善思考的問題。如俄羅斯雖然介於美、中兩國之間，但其經濟市場，卻著實受限於政治上的考量，譬如美國對其能源所生之制裁，真正原因亦為美、俄在烏克蘭問題上所產生的矛盾 (Charap, S., Drennan, J., & Noël, P., 2017)，而這也促使了中俄間經貿往來的機會。

也因為如此，無論是貿易保護政策或帶路倡議，俄羅斯必須思考在兩方間貿易市場中的地位，以及所能得到的利益，並將在政治上的影響降到最低，藉此衡量國內政策該如何因應而規劃 (Mastanduno, M., 2009)。

伍、論美中區域經濟角色互換可能意圖與影響

綜前所述，如圖 8 所示，中國在 2008 年前，為以美國為核心的邊緣國家，輸出第二級產業產品為主。但金融風暴後，中國大陸將經濟結構重整為以內需市場為本，國內經濟相較他國所呈現低迷情況，反之以逐漸成長態樣，進而一躍成為核心國家，並在累積一定資本後，並積極拓展對外貿易 (Zheng, J., Hu, A., & Bigsten, A., 2009)。美國則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導致整體經濟衰退。於此分界點，美、中兩者思考便有所不同。本段試圖解析美、中兩方，所分別採行之貿易保護政策，及一帶一路倡議，所可能之意圖以及希望得到的影響。



圖 8 美、中依賴關係演變

作者自繪

一、從美國觀之

二戰後，美國經濟霸主的地位隨著西方經貿體系的建立而塑造，也因此使美國成為了主要的核心國家。當美國藉由領先的工業技術，以及經貿體系中強調的市場開放獲取利益，並使邊緣國家在產品鍊上與美國更加緊密，產生的經濟連動性，卻連帶影響了軍事、政治，甚至是國際情勢，造成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情形 (Layne, C., 2008)，而美國也藉該優勢及軍事實力，自詡為維持秩序的「世界警察」。

從依賴理論的角度來看，在貿易保護政策施行前，確實符合其核心國家定義。但這種符合的態樣卻是表面的，實際上的美國在 2008 年金融風暴、911 危機後，國內經濟走勢開始下滑，民眾反思美國積極介入其他區域是否為必要行為 (Sapir, J., 2017)。美國如需維持核心國家之地位，除了經濟上與他國連結外，政治上的介入，似乎也成為必然使用之手段。然而回顧歷史，卻可以發現美國介入他國政治，所衍生的軍費、補償、支出，遠超過原欲透過政治、經濟相互牽引所帶來的實質利益。

再者，原先被視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大陸，在領政者以國家政策積極介入，並利用經貿體系所生的保護作用，將產業逐漸轉型、工業技術提升，使其從原先邊緣國家之角色，自外交、經貿等方面，逐漸降低與美國的連結。另因金融風暴爆發後，中國大陸內需市場龐大，減輕了受到世界景氣低迷的影響，此消彼長之下，一舉成為雙極世界下的另一個核心國家。

川普上任後，對美國經濟政策則以另一種方式思考，認為現今美國經濟，實已無法負擔對其他區域對美國的予取予求，也因為如此，川普將經濟發展政策，回歸美國本土，企圖仿效當時中國大陸以內需市場作為切斷受核心國家制約的手段，如退出 TPP 等，都可視為例證。

雖然如此，除了以貿易保護政策作為經濟發展的方法外，美國仍透過貿易體系規則，反制中國大陸的發展，譬如 301 條款之使用、中興通訊 (ZTE) 事件等，都被視為中美貿易戰一環，故可視為川普主政下的美國政府，一方面須對產生問題的國內經濟結構重塑，另一方面卻以經貿「規範」，壓縮中國大陸與其他邊緣國家發展的可能。由於美國與其他邊緣國家，無論在商品、貿易上，仍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連結，當邊緣國家未能積極切斷與核心國家之聯繫時，上下位關係則必然存在。

二、從中國大陸觀之

由於冷戰後，美國為了圍堵共產勢力，在亞太地區所形成的戰略包圍網，造成中國大陸在任何層面都可能受到美國的制肘。縱然鄧小平就經濟層面改革開放，但也僅使得早期中國大陸從以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轉變為勞力密集產業的另一種型態。

當中方加入 WTO 後，藉著其所評定的標準，使得中國大陸能以「開發中國家」，在經貿往來上享受較多的優惠，亦造成當時的第二級產業結構，在利潤創

造上急遽躍升，進而累積足夠邁入下一階段轉型的資本。若從 2008 年前美中經貿關係視之，則可以發現美國核心地位亦無改變，而中國大陸亦屬於與核心國家連結的邊緣國家之一。

但中國大陸依憑著「開發中國家」身分，除了享有關稅上的優惠外，另透過國內法規之限縮，形成外資准入上的極大限制。雖然該手段備受批評，但金融風暴對世界經濟造成的傷害，卻也因為中國大陸多數企業仍有國營、官股影子存在，國家得以實質性的補貼，並從政策上直接轉變，藉此降低國際經濟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 (Wu, M., 2016)。而這亦形成了依賴理論中，邊緣國家切斷與核心國家連結的一種方式。

中國大陸透過經濟結構重整、降低核心國家影響，逐步邁向核心國家，但實質上卻也面臨了國內經濟發展，受限於土地、產能所帶來的停滯，故帶路暢議便為塑造中國大陸成為核心國家最適合之方式，並以此及地緣上的優勢，連結周圍鄰邦，並使其成為依賴中國大陸的邊緣國家。

然而，中國大陸有著美國成為核心國家後，經濟受到邊緣國家所帶來的連帶性衝擊，作為發展的前車之鑑，也因為如此，中方試圖就西方經貿體系中的「市場開放」意涵降低，從較為和緩的「關係」為本，推行帶路倡議之於他國，希望藉此避免其他國家認為中國崛起，對於他國主權可能帶來的侵略式思考 (Lobell, S. E., Jesse, N. G., & Williams, K. P., 2015)。當然，也是為了防範美國以此為藉口，對中國大陸經濟採取如同俄羅斯之制裁手段。

以實際面來看，帶路倡議中對於基礎建設之興建，除技術轉移、材料提供，事實上依然呈現核心國家憑藉著優勢工業技術，從邊緣國家獲取利益的態樣 (Chaisse, J., & Matsushita, M., 2018)。無論是跨洲鐵路（高鐵）、水壩、深水港，都能從其中觀察到依賴理論，所強調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的連結。

帶路倡議的另一種思考，則是中國大陸為了擺脫美國在東亞所造成的經濟影響，憑藉著積攢下來的經濟實力，形成雙極世界下的另一個核心國家，掌握實質的話語權，避免受到美方及相關經貿體系的制肘。

陸、結語

美、中雙方在習近平與川普上任後，無論是區域情勢、經貿戰略，都顯現出與前任領導人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也因為如此，本就詭譎多變的東亞情勢，受到兩個核心國家在各方面競爭所帶來的衝擊，顯得更加風雲莫測。

本文試圖以依賴理論解構川、習兩者，所推行的貿易保護政策及一帶一路倡議，從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之連結，以及中國大陸轉變至核心國家的態樣進行分析，確實能夠得出中國大陸希望憑藉著帶路倡議，和美國轉而發展國內經濟的時機，藉此塑造出雙極世界下的另一個核心國家。

對美、中而言，無論何項政策之使用，主要目的皆是為了提振該國經濟，但與其連結的邊緣國家，卻如同依賴理論中，處處受制於核心國家政策之改變。那麼，如何思考川習領政下的區域經濟，邊緣國家該如何面對？本文提供以下兩點作為發想：

一、如何面對美、中區域經濟角色互換

當美國逐漸將經濟發展主軸移回國內，可能造成邊緣國家在經濟結構上之轉變，縱使其有陣痛期，然亦可趁此機會與其他國家簽訂經貿協議，藉此進行產業結構轉型。

面對中國大陸所提出之帶路倡議，則可以較為寬宏的態度面對，由於帶路倡議所強調的基礎建設興建，對部分基礎設施仍不足的國家而言，將其交由中方興建，一來可解決實質民生需求，二來基礎建設並非移動財，雖然仍須付出利息、經營權等代價，但權衡後若真呈現利大於弊的情況，又何樂而不為呢？

二、雙極世界下的美、中經貿競逐

也是因為美、中雙方爭奪話語權所產生的不穩定，提供了更多國家、區域，趁此機會重新思考國內產業結構是否應該重整，或與他國更加密切的來往，透過經濟上的獲利，從邊緣國家到半核心國家，或依循中國大陸發展的道路，將雙極世界轉變為多極世界。但須考量的一點在於，美、中於經貿上的競逐，所產生的影響可能是整個產業鏈，亦即在全球化時代中，因專業分工所造成的連帶性影響。

另外，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所產生的問題在於，產品、技術單向輸出，獲利卻掌握於核心國家手中，如邊緣國家能夠藉由核心國家之競逐，獲得更多輸出、進口的機會，必然降低風險，能夠掌握的資源、機會亦隨之提升。

總的而論，美國與中國大陸在區域經濟上角色互換，對其他國家而言，可得利益確實不小。無論是帶路倡議或是貿易保護政策，都是兩個核心國家為了己身利益所端出的「政策性牛肉」，或許在雙方競爭之下，為了避免利益受到他方瓜分，核心國家可能產生需要「依賴」邊緣國家的情勢倒轉？

謝誌

感謝匿名審稿委員們對本文之斧正，使其內容與架構更加完善，令作者深感獲益良多。於此特別感謝中研院歐美所韋奇宏研究員就本文初步構想所提供之建議。然本文所有文責皆由作者自負。

參考文獻

- Beeson, M., & Li, F. (2015). What consensus? Geopolitics and policy paradigm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91(1), 97-99.
- Campbell, K., & Andrews, B. (2013). Explaining the US 'pivot' to Asia. *Americas*, 1, 5-6.
- Chaisse, J., & Matsushita, M. (2018).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apping the World Trade Normative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52(1), 168-172.
- Charap, S., Drennan, J., & Noël, P. (2017). Russia and 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Survival*, 59(1), 28-35.
- Clarke, M. (2010). China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New Regionalism", "Vassalization", and Geo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regional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actors* (pp. 119-122). World Scientific.
- Cooper, W. H. (2014). Free trade agreements: Impact on US trade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trade policy. *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Mexico*, 16(3), 456-460.
- Economy, E. (2005). China's rise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44), 414-416.
- Feng, H., & He, K. (2017). China's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11(4), 26-29.
- Ferguson, J. (2010). The uses of neoliberalism. *Antipode*, 41(s1), 169-175.
- Freund, C. (2017). Trump's Confrontational Trade Policy. *Intereconomics*, 52(1), 63-64.
- Garrett, G. (2010). G2 in G20: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Global Policy*, 1(1), 32-34.
- Grosfoguel, R. (2000). Developmentalism, modernity, and dependency theory in Latin America. *Nepantla: Views from South*, 1(2), 348-351.
- Hang, N. T. T. (2018). The US-Asean Relations: an Overview. *Slovak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s*, 18(1), 72-74.
- Hein, S. (1992). Trade strategy and the dependency hypothesis: A comparison of polic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0(3), 497-499.
- Holst, D. R., & Weiss, J. (2004). ASEAN and China: export rivals or partners in regional growth? *The World Economy*, 27(8), 1272-1274.

- Hung, M. T., & Liu, T. T. T. (2009). US Foreig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Explaining US Return to Asia and It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Southeast Asia*, 31(2), 206-209.
- Krekova, M. M., Tupchienko, V. A., Zhagparova, A. O., Lisichkina, Y. S., Novikov, V. S., & Kramarenko, E. R. (2016). China: Anti-crisis potential of the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the social sphe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Issues*, 6(1S), 313-315.
- Layne, C. (2008). China's challenge to US hegemony. *Current History*, 107(705), 17-18.
- Lobell, S. E., Jesse, N. G., & Williams, K. P. (2015). Why do secondary states choose to support, follow or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2(2), 153-155.
- Mastanduno, M. (2009). 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 US 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61(1), 143-153.
- Milner, H. V., & Kubota, K. (2005). Why the move to free trade? Democracy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1), 120-126.
- Noble, W. (2017). China: A Poor State in a Rich-State Dominated World Trade Regime. *International Review Spring 2017*, 70-75.
- Nye Jr, J. S. (1990).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5(2), 179-181.
- Pérez Caldentey, E., & Vernengo, M. (2016). Raúl Prebisch and economic dynamics: cyclical growth and centre-periphery interaction. *Cepal Review*, 11-13.
- Paul, J., & Mas, E. (2016).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nd India in the global market. *Journal of East-West Business*, 22(1), 32-46.
- Poncet, S. (2005). A fragmented China: Measure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disinteg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3), 411-413.
- Pye, L. W. (1995). F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guanxi: paradoxes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The China Journal*, (34), 43-46.
- Reyes, G. E. (2001). Four mai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world-systems and globalization. *Nomadas*, 4, 2-12.
- Sapir, J. (2017). President Trump and free trade.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64-70.
- Shalan, A. S., Reast, J., Johnson, D., & Tourky, M. E. (2013). East meets West: Toward a theoretical model linking guanxi and relationship marketing.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6(12), 2515-2516.

- Shih, C.Y. (2017). The Relational Turn East and West From Chinese Confucianism to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한국정치학회보*, 51(6), 109-112.
- Smith, T. (1979).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literature: the case of dependency theory. *World Politics*, 31(2), 249-259.
- Storey, I., & Cook, M. (2016). The Impending Trump Presidency and Southeast Asia. *ISEAS Perspective*, 63, 22-24.
- Swaine, M. D. (2015). Chinese views and commentary on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47(2), 5-6.
- Tausch, A. (2010). Globalis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relevance of classical “dependency” theory for the world toda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61(202), 472-475.
- Uche, L. U. (1994).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dependency theory. *Africa Media Review*, 8(2), 53-54.
- Wade, R., & Veneroso, F. (1998).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8-9.
- Wallerstein, I. (1974). Dependence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The limited possibilities of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African Studies Review*, 17(1), 4-5.
- Weeks, J. (1981).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terialist theory and dependency theory and why they matter.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8(3-4), 119-120.
- Wilson, J. D. (2015). Mega-regional trade deals in the Asia-Pacific: Choosing between the TPP and RCE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5(2), 346-349.
- Wu, M. (2016). The China, Inc. Challenge to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Harv. Int'l LJ*, 57, 263-266.
- Yang, Z., Wu, S., & Shen, Y. (2017). Monetary Policy, House Prices,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A 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y.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 20(1), 28-32.
- Yu, Q. (1998). Capital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vidence in the 1980-1990s. *China Economic Review*, 9(1), 74-75.
- Zheng, J., Hu, A., & Bigsten, A. (2009). Potential output in a rapidly developing economy: The case of China in comparison with the US and EU.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91, 338-342.

Analysis with Dependency Theory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 Role Exchange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U.S. Caused by Trade Protection and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Jia-Ying Lyu¹

Abstract

Since Donald Trump took the office, he dropped the 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which was once promoted by Barack Obama. President Trump attempts to shift the core of economic back to the U.S. with protection policy. With One Belt One Road, the PRC,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cific Ocean to the U.S., has built a “Guanxi” linkage across Europe, Asia, and Africa on funds, infrastructures, and transportations. The trade policy from the present leaders of the PRC and the U.S. are poles apart from the ones of former leaders. This study takes Dependency Theory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the co-move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state and peripheral state. Moreover, the related policies and diplomacy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U.S. is going to be discussed. As the regional economic roles that the PRC and the U.S. play are exchanged due to the protection policy and One Belt One Road, the intentions of changing policy from both sides and its possible impact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study.

Keywords: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One Belt One Road, Trade Protection, Dependency Theory

¹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Jia-Ying Lyu, E-mail: m0227118@gmail.com